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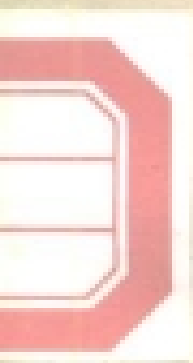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希腊拉丁作家 远东古文献辑录

〔法〕戈岱司 编 耿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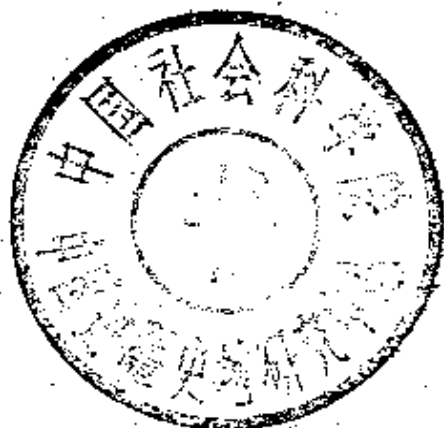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希腊拉丁作家 远东古文献辑录

[法]戈岱司 编

耿 昇 译



1542
中华书局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EXTRE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ECLE AV. J-C. JUSQU'AU
XIV^e SIECLE
RECUEILLIS ET TRADUITS PAR
GEORGE COEDES
PARIS 1910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

XILA LADING ZUOJIA YUANDONG GUWENXIAN JILU

(法)戈岱司 编

耿昇 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8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6³/₄，印张·111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统一书号：11718·1332 定价：1.15元

ISBN 7-101-00016-9/k·7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译者的话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 (George Coedès) 于 1886 年 8 月 10 日出生于法国巴黎, 1969 年 10 月 2 日于巴黎逝世。他一生中以研究东南亚碑铭、历史和语言文献而著称。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菲利奥扎 (Jean Filliozat) 曾于 1970 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57 卷中介绍过他的生平和著作。

在 1903 年之前, 戈岱司在卡尔诺 (Carnot) 中学学习, 1905 年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又于 1906 年获得了德文高级研究文凭。1908—1909 年间任昆多塞 (Condorcet) 公立中学的德文教师。他后来又阿拉斯在工程兵中服兵役, 从 1909 年 10 月到 1911 年 9 月任工兵学院图书馆馆员。在此之前, 他是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宗教系的学生, 于 1904 年首次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发表了一篇论用梵文和吉蔑文(柬埔寨文)撰写的 639 年的碑文的论文, 因为他在中学时就攻读了这两种文字, 所以才使他得以解读此碑并翻译刊布。

从 1904 年以后, 无论是在准备大学考试、服兵役, 还是担任其它行政职务, 都没有阻碍戈岱司发表学术著作。从 1905 年至 1909 年, 他分别于《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和《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柬埔寨碑铭的论文。1910 年翻译编

译了《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他从此才开始接触中国学。1911年11月18日，高等实验研究院向他颁发了宗教学系文凭。同年12月19日，他又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寄宿生。于是，他就有机会直接前往东南亚进行实地考察了。

1914年，戈岱司升任印度支那语言文献教授。当时法兰西远东学院并不是一个教学机构，而是一个研究机构，在考古发掘和出版方面颇有成绩。但戈岱司在那里实际并未任教，事实上他一生中仅在1928—1929年和退休之后于1947—1948年间于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执教席。他退休之后还曾于1947—1948年间任人类—生物高等学院的人种学教授，但这并非他之所长。

戈岱司于1918—1929年间离开了法兰西远东学院，于1918年1月1日到1926年12月31日间在泰国曼谷国立图书馆任职；从1927年1月1日到1929年12月31日又任暹罗王家学院秘书长。1929年9月2日他回法兰西远东学院任院长，直到1947年6月30日退休为止。在此之前六个多月，他又在埃内里(Ennery)博物馆任职，直到逝世为止。他于1934年被选为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通讯院士，1958年正式成为该院院士。从1964年以来，他又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

戈岱司一生中著作颇多，据菲利奥扎的统计有三百多种，主要是印度学和东南亚碑铭研究方面的。

戈岱司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是一部有关东西交通史的名著。冯承钧先生过去曾将该书译作《希腊古地

志》，但我们认为现在所使用的书名更为确切一些，所以没有沿用旧名。

这本书囊括了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期间九十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关于远东(主要是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指中国,此外还包括印度、南海和中亚的某些地方)的记载。戈岱司所搜集的文献相当广泛和全面,而且都是一些原始史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料。所以尽管此书问世历时颇久,但仍不失其重要学术价值。

书中所引用的地名和民族名称大都难以考订。虽然近几十年来的中外学者们对此作过不少努力,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至今大都无定论可言。戈岱司本人也只满足于摘录、编选和翻译,而基本上未作多大考订,只是在地名索引中举出各家学者的观点(详见其文的序言和索引部分)。我们在译成中文的过程中考虑到了这一情况,决定尊重原作者的本意,所以对于书中的地名和民族名称,除了那些已经形成定论或有相当把握的之外,我们也一概不作考订,仅采取音译而不主张过多地采取意译的办法。这一则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以胜任如此艰难的考订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不歪曲原作者的本意或强作解人,也不囿于一家之言。我们翻译本书的目的也仅满足于将原文如实地提供给读者参考,由他们利用本书的原始资料并广泛联系其它史料而各抒己见,创造性的进行考证之用。为了使大家便于对照参考,我们在翻译时一律将原名附在译名之后的括号内,音译名称仅供参考,在使用时一律以原名为准。

对于书中所提到的作者名字,凡有约定俗成的译法的,我

们也尽量沿用；其余的人名则一概采用音译，并且将原文附在括号内。

为了使大家便于对照参考原文，我们在译文的页边标注了原文的页码，索引部分也是按原页码制订的，一律不再变换成译文的页码。

本译文《导论》部分的初稿系由杨佩纯同志所译，后经我作了校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中华书局的编辑同志曾耐心地作了校正，张毅先生也作了部分校对，特此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和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耿 昇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1981年岁末

序 言

v

在那些古典作家们所憧憬的遥远国土中，“黄金之国”和“丝绸之国”似乎是他们特别钟情的对象。诗人们的隐喻和学者们的论述不胜枚举，但是关于这些近乎神话般的地区的准确资料却极为罕见，文献学家们至今一致认为这些神话地区就是恒河两岸的印度和中国。然而完全有必要从那些绝妙故事的珠目混杂之中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虽然蕴藏这些资料的绝妙故事本身是没有多大文献价值的，它们只是欧洲了解远东的初步概念，但其中一部分记载有不可否认的史科学或者地理学价值。

本汇编中没有一篇不是尽人所知的文献，也没有提供任何未曾公开刊布的著作，其目的只是想以简单的方式搜集一批零散的片断，而且它们又大都是为东方学者们很熟悉的。

这部辑录的标题本身决定着其地域和时代的界限。我有意排除了有关印度和斯基泰(Scythes)的全部段落，因为把它们搜集起来就可以编成几大卷，所以我仅局限于远东地区。VI 有关“赛里斯”人的地区，我只转引了一些作为人种名称而使用的文献，并故意将大量有关“Sericum”(指丝绸、赛里斯织物)的引文弃之不用。这本辑录并不是一部有关丝绸历史的专著。

在导论中,我一边进行整理,一边试图概述文献中所提供的资料,并试图以此来补救这本辑录中肯定显得支离破碎的弊端。我于其中有意避免了有关古地理名词考证的全部争论:这一领域是一片流沙之地,不止一个人曾经在此陷了进去。此外,我还认为在一部资料性的文集里进行这些争论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应该保持其纯洁的客观性。然而,我认为走马观花似地简述一下自丹维尔(d'Anville)以来的各大家学者们所提出的解答是有用的,人们会在书末《地名索引》中找到这些东西。我在这个索引中作了某些发挥,同样也是为了要在本书的正文之外来解除这些麻烦。这本辑录是由最佳版本^①中摘录的文献所组成,并附有专有名词各种有关的不同书写形式。

^① 见温斯泰德(M·Winstedt)的著作,《科斯玛斯〈基督教诸国风土记〉》(附有地名考证),1910年版,4开本。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是在这本辑录付印之后,我才得到了它。

导 论

VII

关于远东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共有两大类。一类是纯文学作品，即一些简单的引文或短小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些片段的历史和地理事实，但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它是学术界中各种知识的反应；另一类是从某些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作品中摘引的，它对东方学者来说当然更加宝贵。令人遗憾的是后者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原始资料已经失传，而作者们又厚颜无耻地互相抄袭。在这样的反复抄袭中，专有名词都很少能保持其原形。这足以说明在使用这两类文献时要格外小心谨慎。然而，人们还不懂得赋予这些文献很大的价值，若没有它们，写作有关东方和西方关系那一章的尝试就得放弃了。

总 书 目

这批文献中的一部分已为人们专门研究过，这得提请大家注意。

某些作者热衷于从中摘录有关丝绸的制造和贸易史的部分，其中有：

马胡德尔(Mahudel)：《丝绸的起源》，见1725年号《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第218页。

VIII 布罗蒂埃 (Brotier): 《论古罗马人对丝绸的认识和使用》, 同上刊物, 1784 年号第 452 页。

帕尔德黎斯 (Pardessus): 《论古代人的丝绸贸易》, 同上刊物, 1842 年号第 1 页。

巴利赛 (Pariset): 《丝绸史》, 1862 年—1865 年巴黎版, 8 开 2 卷本。

自丹维尔 (d'Anville) 以来的所有作家们都关注于古地理学, 这自然就会促使他们去引用和讨论与本书有关的大部分文献。所有想了解古代地理学理论和学识概况的人主要会参考以下论著:

丹维尔: 《古代地理学》, 1768 年巴黎版, 12 开 3 卷本, 附有地图。

——《古人传说的赛里斯的地理与历史的研究》, 见《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 1768 年号第 573 页。

——《古人所知的恒河以远的大陆限度》, 同上, 第 604 页。

戈斯兰 (Gosselin): 《古希腊地理学概述》, 1790 年巴黎版, 4 开本。

——《古代系统和实证地理学研究》, 1797 年—1813 年巴黎版, 4 开 4 卷本。

黑伦 (Heeren): 《论古代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政治、交通和贸易》, 1793 年哥廷根版, 12 卷本。

马内尔特 (Mannert): 《古希腊罗马地理学》, 1788 年—1825 年纽伦堡版, 8 开 5 卷本。

尼切 (Nitsch): 《古代地名词典》, 1794 年哈雷版。

——《古代地理简图》，1802年(第4版)莱比锡版。

乌凯尔特(Ukert):《古希腊罗马地理学》，1816年—1821年魏玛版。

赖夏德(Reichard):《古代地理书中的地图》，1827年纽伦堡版。

赖恩加诺姆:(Reinganum):《古代地理及地志学史》，1839年版。

史密斯(Smith):《希腊和罗马地理学辞典》，1854年—1856年伦敦版，8开2卷本。

圣马丹的维维安(Vivien de Saint-Martin):《地理学及地理发现史》，1872年巴黎版，4开本，附地图。

福尔比杰(Forbiger):《古地理学手册》，1877年版。

基佩尔特(Kiepert):《古地理学教科书》，1878年柏林版。

邦伯里(Bunbury):《希腊与罗马古代地理学史》，1879年伦敦版，8开2卷本。

IX

贝格尔(Hugo Berger):《希腊人的科学地理学史》，1887年—1893年莱比锡版，8开4卷本。

米勒(Miller):《世界地图》，1895年—1898年斯图加特版，4卷本。

以下著作对关于远东的文献作过更为专门的研究:

德经(De Guignes):《北狄通史》，1756年—1758年巴黎版，4开5卷本。

——《罗马人与鞑靼人及汉人贸易往还考》，见《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1768年号第355页。

——《中国和西域各族贸易考》，同上刊物，1793年号第575页。

克拉普洛特(Klaproth)：《亚洲史概述》，1824年—1826年巴黎版，4开本。

——《亚洲论丛》，1824年—1828年巴黎版，8开3卷本。

德·洪堡特(A.de Humboldt)：《中亚》，1843年巴黎版，8开3卷本。

拉森(Lassen)：《印度古物志》，1844年—1867年波恩版，8开5卷本。

圣马丹的维维安(Vivien de Saint-Martin)：《关于希腊、拉丁及印度地理学研究》，1858年—1860年巴黎版，4开3卷本。

鲍迪埃(Pauthier)：《中国的政治关系史》，1859年巴黎版，8开本。

雷诺(Reinaud)：《公元初五世纪间罗马帝国和东亚的政治和商业关系》，见《亚细亚学报》，1863年号(第1卷)第93页和297页。

裕尔(Yule)：《东域记程录丛》(《契丹及其通向那里的道路》)，1866年伦敦(哈克鲁学会)版，8开2卷本。

——《西亚通中国海道古文献考》，载《皇家地理学会论文集》，1882年版第649页。

李希托芬(Von Richtofen)：《中国亲身旅程记》，1877年—1878年柏林版，4开2卷本，附有地图。

普勒(Pullé)：《印度古代地图》，1901年佛罗伦萨版，8开2卷本(载《意大利印度——伊朗古文献研究丛书》第4卷

和第5卷)。

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1903年圣彼得堡版,4开本。

某些作家,例如德经^①和黑伦,他们都认为希罗多德(Hérodote)著作(第4卷)中首次提到远东民族。德经把阿尔吉贝人(Argippéens)考证为汉人,黑伦则将此看作是现今汉地附近的卡尔梅克人(Kalmouks),他们与汉人之间只是由伊赛顿(Issèdon)部族所分隔。希罗多德的知识不可能延伸到如此辽远。一般来说,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著书立传的梅加斯泰纳(Mégasthène)、埃拉托斯泰内(Eratosthène)和其他一些作者的地理概念都没有超过突厥斯坦,而且他们的资料也相当贫乏。他们向我们提供的全部情况就是该地区居住着塞种人(Sacae),后来又被吐火罗人(Tochari)驱逐走了。至于位于更靠东部的地区,似乎完全无人知晓。然而,可能从希罗多德时代起,中国的丝绸就传到了西方。据普罗科波(Procopé)认为^②,希罗多德多次谈到米提亚人(Médique)的织物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丝绸。下面就要说到的“赛里斯织物”这一术语本身首次出现在尼亚格(Néarque)的著作中,但是不应忘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原稿已经失传,我们只有通过从生活在哈德良(Hadrien)皇帝当朝时期的阿

^① 德经写了一篇试图确定希罗多德著作中谈到的某些斯基泰民族的方位和研究在这位历史学家时代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的著作,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1770年号,第539页。

^② 见《波斯战纪》第1卷,第20节;《旺达尔(Vandal)战纪》第2卷,第6页。参阅巴里赛:《丝绸史》第1卷,第43页。

里安(Arrien)的著作中才知道这一论著。作为一种妥善的办法,人们不能够仅仅根据这些资料就肯定,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前,地中海沿岸诸民族就已经开始了解和猜测远东地区了。

正是奥古斯都(Auguste,又译屋大维。——译者)时代的诗人们首先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资料。维吉尔(Virgile)、霍拉赛(Horace)、普罗佩赛(Propertius)和奥维德(Ovide)都提到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这是居住在靠东方、印度和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ne)一侧的一个民族,他们生产一种漂亮的织物,所用的原料是从一些树上采摘来的神秘物。XII 这一产品明显是指丝绸,它是从蚕茧中所缫,而蚕茧正是从桑树叶子中采收的。至于这一民族,它倒不一定是汉人,人们经常不断地重复这一论点。如果这一名词明显地起源于东亚^①,那末它就是相继或者同时指一些差别大的部族: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我们将于下文谈到,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泛指许多种族的。

对我们来讲,这些早期的拉丁文资料是与由汉籍所提供的资料的珍贵共鸣。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曾向西域派出了一支由张骞指挥的远征军,以图与吠哒或者大月氏结盟共同反对匈奴(Huns)种的突厥人。这次远征开辟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并且确保了它在一段时间内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公元前114年,第一支沙漠商队离开了中原奔向西域诸邦^②。

① see(指汉人的)、sir(指高丽人的)、sirket(指蒙古人的)以及 sirghè(指满族人的)均指丝绸的名称。参阅克拉普罗特:《中国诸名考》(见《亚洲论丛》,第3期,第264页)和裕尔:《西域纪程录丛》第44页注释1。

② 李希托芬:《中国》第1卷,第455页和475页。

斯特拉波(Strabon)增补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我们在下文将有机会经常引用:赛里斯人特别高寿。但是除此之外,他似乎不比其他诗人了解得更多。尽管如此,他关于亚洲的地形地貌及地域大小的讨论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位于有居民的世界最东端地区的地形轮廓^①。斯特拉波大致上采纳了埃拉托斯泰内的分类法,而后者又是受迪赛雅克(Dicéarque)之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影响。在东部,亚洲大陆濒临大洋,陶鲁斯山脉(Taurus)最远延伸部分伊麦奥斯(Imaios)山山峰就一直延伸至大洋中,构成塔玛隆(Tamaron)海角。在这个岬角的北部,海岸折向西方,位于伊麦奥斯山峰、陶鲁斯山脉、里海和大洋之间的亚洲地段呈大厨刀形,赛里斯人占住了最东端的地带。

斯特拉波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细节,无论是在风俗习惯 XIV
方面,还是在赛里斯人地区的地形外貌方面一概如此,而梅拉(Pomponius Mela)和老普林尼(Plinie L'Ancien)对此却已经了解得非常多了。他们可能取材于共同的原始资料,因为他们所说的部分事实是相互吻合的。

梅拉认为赛里斯地区位于由东海流经的亚洲沿岸的中段,他们北部以塔比斯山与斯基泰人相隔,南部以陶鲁斯山突入海中的余脉塔穆斯岬与印度人相隔。与他们北方邻邦吃人肉的斯基泰人和塞种人截然不同,后者的地区几乎无法进入,而赛里斯人满怀正义,致力于贸易。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交易,即把商品放在某些偏僻的地方,然后就退避,恭候

^① 参阅杜波伊斯(Dubois):《斯特拉波地理学研究》,1891年巴黎版,8开本。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买主前来取货。

普林尼用一种略为详细的方式向我们述说了同样的事情,并且还提供了关于赛里斯土产的某些情况:他们那里几种树的叶子上覆盖以一种白色的绒毛,赛里斯人以洒水法把绒毛冲下来。然后将这种原料一直远销到罗马帝国,再由罗马的妇女们将之加工,经过缫丝纺线便织成一种纤细而又透明的织物。赛里斯人还出口铁和毛皮。这些人身材魁梧,红头发,蓝眼睛,声音嘶哑,举止粗野。从普林尼著作的片断中可以窥见,“赛里斯”一名似乎是用来指许多民族的总称,或者是他思想中把进行丝绸贸易的不同民族混为一谈了:塔普罗巴纳*(Taprobane,即锡兰,今斯里兰卡,下同。——译者)居民在他们岛上^①所发现的赛里斯人以及与斯基泰人、塞种人毗邻的赛里斯人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无论如何,普林尼熟悉了关于赛里斯人地区的一些地理概念,他提到了三、四条江河,还提到了居住在该国与印度之间各地区的一些部族名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中之一就是定居在突厥斯坦的吐火罗部族,这一史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标志。毫无疑问,同样也得在突厥斯坦去寻找那位博物学者(指普林尼。——译者)向我们所谈到的那些红头发、亮眼睛的人。由德国考察团^②最近在中亚所发现的一些奇特的壁画也绝妙地

① 参阅肯尼迪(Kennedy):《Seres 是 Cheres 吗?》,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4年号,第359页。

* 《孔雀王经》僧伽婆罗译本作担罗拔魔国,义静译本作赤铜色,因此字来源于梵文 Tāmraparṇi,意即铜片。——译者。

② 勒柯克(Von Le coq):《吐鲁番考古记》,载《亚细亚学报》,1909年第2期,第323页,《法兰西亚洲委员会通报》,1909年6月号,第230页。

表明了普林尼这段记载的准确性,并且使之更为鲜明突出。

在梅拉和普林尼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金洲(Chrysê)和银城(Argyrê)这两个奇特地区的名字,上述两个地方的土地分别由金银组成。这里是两个岛屿,梅拉认为它们地处塔穆斯和恒河一侧,而普林尼则认为它们地处印度河口附近。约瑟夫(Flavius Josêphe)也提到了金洲,但他只是说这是印度的一块土地,相当于《圣经》中的 Sôphir。这些非常模糊的资料仍不足以使我们大致确定“黄金国”的地理位置。我们于此仅限于指出以下一点:据普林尼认为,金洲是赛里斯地区一个岬角的名字。但对此仍需要继续进行研究。

卢坎(Lucain)、西流士·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斯塔西(Stace)、朱维纳尔(Juvénal)都曾多次谈到赛里斯人,他们与奥古斯都的诗人们的用语措辞相近;由于受某一地理学理论的错误影响,卢坎把赛里斯人地区确定于尼罗河的发源地;伊塔利库斯讲得更清楚一些,他认为赛里斯人居住在远东,而且他们最先受到阳光照临。

人们经常引用的福罗鲁斯(Florus)的一段论述告诉我们,在为奥古斯都大帝举行圣职授任礼时(公元前27年),有一个赛里斯人地区的使团到达罗马。这件事本身就不大像是真实的,李希托芬^①认为这是福罗鲁斯惯用的一种夸张之词。他的这一看法肯定不无道理。如果这个使团确实到过罗马,那么人们不会不在汉文史籍中或者在其它拉丁史学家的记载中发现其反响的。

^① 上引李希托芬《中国》一书,第1卷,第475页。

对东方学者来说,《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是一部特别重要的文献。人们长期以来将该书说成是阿里安(Arrien)的作品,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是公元一世纪末的作品,出自于亚历山大城某商人之手,作者姓名失传^①。应该感谢这位作者,他虽不是渊博之士,但却直朴无华地记叙了他之所见所闻。他的记叙极其生动,并常常比托勒密(Ptolémée)的图表更有教益。他向我们提供的资料在一个重大问题上与刚才浏览过的文献迥然不同。后者是从由远东经陆路而来的商人们的记叙中汲取资料的,而《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本人则是一个沿印度洋海岸航行的海员。若干世纪以来,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地区就逐渐建立了海上联系。自从腓尼基人首次到厄立特里亚海冒险以后,大流士(Darius)皇帝海军司令苏拉克斯(Scylax)、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司令尼亚格也曾向那里派遣过船队。公元一世纪时,埃及的一位希腊舵手希巴罗斯(Hippalos)曾大胆地让船只随季风的定期风向扬帆远航。然而《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却首先向我们谈到了位于恒河口以东地区;这里首先是黄金之国“金洲”,它面对一个同名的岛屿,此岛使用一种名叫“科兰迪亚”(Kolandia)^②的大帆

① 参阅米勒:《希腊地理小丛书》第1卷(迪多德版本),《绪论》部分第XCVI页和法不里克鲁斯(Fabrieus)版本的序言。除了上文所列总书目中的一般著作之外,雷诺还曾特别研究过《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见《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考,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论丛》,1864年号,第22页;麦克·格林德尔(Mac Crindle)也研究过此书,见《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载《印度文物志》杂志第8卷,第107页。

② 这个单词无疑与梵文 Kolam (《尊喻经》第56页第9和第11行)或者 Kaulam [《翻译名义大集》和泰帕南碑文(未补卷)]相近似,它指的是一种船。参阅《亚细亚学报》,1908年第2期,第253页。

船与南印度保持商业往来。经过该地区之后,再沿岸北上,一直到达一个具有一座名叫秦尼(Thinai)的内陆大城市的地方。此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丝线和丝绸。第一条道路经过大夏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之布罗奇)大商业中心,另一条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①。秦尼地区与贝萨特人(Bêsatai)为邻,后者是野蛮人,他们每年都要流窜到首都的周围,并随身携带大量的芦苇,苇叶可用来制作香叶,这种东西也向印度出口。

这些简单扼要情节都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其中提到的国家地区也是比较容易考证清楚的。“金地”无疑就是印度文献中的 Suvarṇahūmi 之意译,它指的至少是孟加拉海湾东部沿岸地区的一部分;鉴于“金岛”的方位,它只能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或马来半岛本身。所以,《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具有足够的确证使我们确定该岛和“金洲”海岬的方位,我们在梅拉和普林尼的著作中发现了它们的 earliest 记载,而且可能就相当于位于孟加拉湾东部地区。至于人们沿海岸北上而到达的秦尼地区,它的名字^②、方位和贸易特征足可以使人看出系指中国,即一个与赛里斯地区的称呼完全相同或相毗邻的地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有另一条经过大夏的沙漠商队之道(正是经过这条路,有关丝绸之国的资料才传到地中海地区),但他也向我们指出了一条海路,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证实秦尼就是中国及其附近地

XVIII

① 毫无疑问是通过海路。见《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 60(第 22 页)。

② 我们从伯希和先生的大作《交广印度两道考》(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 卷,见第 143 页以下)发现有关“支那”一名起源讨论的概况。

区。裕尔从香叶(malabathron)中辨认出了梵文词 tamā-lapattra(藿叶)^①是指一种桂树的叶子,这种树主要生长在阿萨姆,它与藜叶有相同的用途。因此,完全应该如同李希托芬^②那样来确定贝萨特人的方位,即将之置于从西南部环抱中国的山区,介于阿萨姆和四川之间。

总之,《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有送远东的三四段记载对中国在公元一世纪末左右和邻国以及西方的贸易关系作了比较准确的概述。它们证明作者对东亚总的地貌有了准确的概念,其中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某些游记的真实面貌,因为这些游记不幸已失传了,而它们正是推罗(Tyr)人马利努斯和托勒密著作的基础。

推罗人马利努斯和埃拉托斯泰内与希巴尔克一样,也是古代人精确地理学的创始人。根据各种迹象来看,他的著作大概是于公元一世纪末叶写成的,十分遗憾的是此书没有流传下来。托勒密声称对该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仅从托勒密书中的一些引文来看,就足使我们对原作的失传感到非常遗憾了。关于远东地区,马利努斯使用过若干游记,托勒密与其说是一位地理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数学家;他只保留了这些游记的目录。相反,马利努斯的著作明显包括一部分叙述和描绘性的内容,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参照一下托勒密书的绪论就足够了^③。

XIX

阅读一下托勒密书中关于远东的一些章节,人们真为地

① 见裕尔:《西域记程录丛》,第1卷,第144页。

② 李希托芬:《中国》第1卷,第502页注②。

③ 尤其请参阅第1节,第5—6行(第29页,第12、4、7行,第32和33页);第14节,第1行(第39页)。

理学知识在一个世纪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深感惊讶。对于这种发展的原因，应该到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活动中去寻找，而这种贸易往来正是公元后二世纪的特点，166年^①的著名使团正是这种特点的最明确证据。那些从长途跋涉而归来的商人们满口都是一些荒诞古怪的故事。其中一部分商人，正如《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那样，或者如象马埃斯和下文将要谈到的那位亚历山大，他们都用文字记载了自己的感受。正是由于这些各式各样的游记才使托勒密绘制了书中的图表和地图^②。

由于这些游记故事内容丰富和数学式的精确来确定了河流、山脉、城市和部落的地理位置，因而受到了敬重。人们认为某些作者曾试图借助于适当的计算“校勘”托勒密的地图。这一方法的目的就是以一条或数条已形成定论的考证来决定托勒密所犯错误的道理和程度，然后再把如此得到的格式运用到地图的其它地段，以便从数学角度来推断全部地名的准确位置。对欧洲的某些地段来说，这种方法也许能取得某些成果，但对于那些致力于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东亚的人来说，必然会得出一些令人绝对无法接受的结论^③。这种作法获得了

① 汉朝的断代史中谈到了由大秦国(罗马帝国)安敦皇帝(Marc-Aurèle Antonin)派来的一个使团。但不能肯定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使团。但如有一个罗马商人盗用其皇帝的名义而摆出一副真正使节的姿态，那也毫不足怪。

② 本书中转载的两幅托勒密地图转引自1478年的罗马版本。决定这一选择的两条理由是：这些地图是用拉丁文绘制的，众所周知，托勒密书的各种拉丁文本在某些方面与希腊文校订本有所不同；另一方面，1478年的版本标志着地图绘制史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是用钢版雕刻法印制的第一本地图集。

③ 参阅格里尼(M·Gerini)的观点(1897年号的《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亚细亚学会专刊号》)。

令人难以相信的适得其反的效果，只要认真地阅读一下托勒密地理书的绪论就足以理解所有试图校勘的打算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妄想。事实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看一看托勒密所了解的远东和他安排所采用资料的方法。

托勒密和希巴尔克(公元前二世纪人)一样，也承认印度洋是一个封闭性海洋，其最东地段北部以印度外恒河流域的半岛为界，东部以秦奈地区沿岸为界，南部以一片未知地带为界。北部以恒河以远的印度以及秦奈地区分别与伊麦奥斯山以远的斯基泰和赛里斯接壤。位于更靠东边的所有地区一概无人知晓。

马利努斯和托勒密在对斯基泰和赛里斯的地理描述时，所使用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一位马其顿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Maês Titianos)的游记，后者在东游时曾沿着通往赛里斯地区的一段道路前进，并且笔录了他那些曾深入该地中心的同伴们的口述。一些沙漠商队从大夏出发先朝北行进，一直抵达科麦德人(Kômêdoi)地区，越过这一山区以后，又迂回向南^①，直到一个向平野敞开的岬谷；由此朝北，沿着长五十“雪尼”^②之遥的大道而直抵石塔(Lithinos Pyrgos)。从石塔直到赛里斯的首都赛拉城(Sêra)，马埃斯商队的旅行共达七月之久，一路上与骇人听闻的风暴搏斗。毫无疑问，他们

① 很明显，对于其中所谓“北方”、“南方”等术语，不应过分咬文嚼字。就本文的情况而言，应该理解为沿某一方向前进一段时间之后，大道突然朝相反的方向绕弯迂回。这里正是阿姆河与瓦什赫河谷之间的地势。

② “雪尼”(Schoene、Schêne，或译作“程”)是波斯用以衡量路程的单位。有关其长度问题，请参阅劳林逊爵士(Sir H. Rawlinson)：《阿克巴丹纳遗址》，李希托芬：《中国》第1卷，第499页注①。

首先在沙漠旅行队客店停歇，然后在进入赛里斯国本土之前先到达斯基泰伊赛顿(Issêdôn Scythique)城和赛里斯伊赛顿(Issêdôn Sérique)城。

这条道路的轮廓由于中亚考察团最近的考察工作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李希托芬^①已经全部阐明了这条路线的行程。尽管巴尔赫(Balkh)和于阗(Khotan)之间这段路程不属于这部论著的范围，但它特别重要，我们不得不再费些笔墨。大家可以在本书所附的地图中发现这段路程。在沿着阿姆河行进一段之后，大道经过一段山路，一面是这同一条河流和瓦什赫河流(斡水)，另一面是卡拉特勒(Karategin)诸小溪^②。然后又自瓦什赫河谷出来，毫无疑问，石塔正是矗立在那里，其确切地址尚未考证出来。沙漠旅行队客店的位置恰好标注在塔里木盆地的门户，这里与另一条同样也很重要的通商大道相汇合，后一条道路经过捷列克大宛山口(Terek Davan)到达费尔干纳(Ferghana)。一旦他们经过这两个伊赛顿城，即疏勒(Kachgar)和于阗，商人们就置身于赛里斯国(塔里木盆地东部和中国本土)了，其首都赛拉城似乎就相当于皇宫所在地西安府。 XXII

如果马埃斯的路线已被令人满意地阐述清楚的话，那末对于托勒密地理书中的斯基泰和赛里斯则仍然暧昧不明。人们已清楚看到，伊麦奥斯山应相当于帕米尔，埃模达(Êmô-da)群山相当于喜马拉雅山，卡西亚(Kasia)群山相当于昆

① 《中国》第1卷，第595页以下。

② 这就是科麦德人地区，劳林逊(1872年《皇家亚洲地理学会会刊》第CXCIX页)和裕尔(《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873年号第98页)的著作确定了古代穆斯林作者们提到的科麦德人的方位，从这以后，这一地区的位置就已经确定。

仑山，奥扎基亚 (Auzakia) 群山相当于天山山脉，奥伊哈尔德斯河 (Oikhardès) 的三条支流相当于疏勒河 (Kachgar)、叶尔羌河 (Yarkand) 和于阗河。但是为了能够通过校正托勒密地图而重新找到上述城市及部落的准确遗址，我们还应该比现在更透彻地了解他制定地图的方法，目前对他的方法的一知半解尚不足以鼓励我们从事这项研究。例如，他把赛拉城确定在石塔以东的 $45^{\circ}15'$ 的经度上 (第 1 卷, 第 12 章, 第 1 节), 但他是怎样才获得这一数据的呢? 因为我们已知道, 从石塔到赛拉城之间的旅行长达七个月之久。然而, 对于他来说, 七个月的旅途就相当于三万六千二百节 (古希腊长度单位, 约合一百八十米。——译者。第 1 卷, 第 11 章, 第 3 节)。为了精确计算这两个地方之间的经度距离, 那就必须将这一数字大大缩小, 首先是因为旅途中曾多次迂回曲折, 旅行时的条件也极其恶劣 (第 1 卷, 第 11 章, 第 5 节), 此外还因为这两个地方不在同一条纬度线上 (第 1 卷, 第 12 章, 第 1 节)。“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将这个数字缩小一半, 还剩下一万八千一百节, 即相当于 $45^{\circ}15'$ ” (出处同上)。总之, 这样作的目的在于把这个唯一而又特别含糊的数据 (七个月的旅行) 推算成一个准确的数字, 即 $45^{\circ}15'$, 其方法的设想可能是正确的, 而落实时则是武断的。对于斯基泰和赛里斯地图上所标明的其它地名的各自方位, 我们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方法为基础的, 而且我们既不知道这些方法是否已有人修改, 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面貌。在这样的条件下, 难道把一切校正尝试都说成是妄想未免言之过早了吧?

XXIII

对有关恒河两岸的印度和秦奈地区章节的研究, 也会使

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①。

对于托勒密来说,位于恒河以远的印度呈一个半岛状,恒河海湾流经它的西部,大海湾流经它的东部。对于一些已经为人所知的名字,我们在恒河海湾沿岸仅找到了金洲和银城等地名,半岛的最南端本身也被称为金洲(Chersonêse d'or)。大海湾在东部流经秦奈地区的海滨,而秦奈地区最后一个可进入的地方是卡蒂加拉(Kattigara)港口。根据马利努斯以后时代的一些航海家们的资料,托勒密知道于此以远的地区是一片沼泽,而且还布满泥潭,但那里有一条从卡蒂加拉通往秦奈首府的道路,秦奈首府位于卡蒂加拉的东北部和赛里斯首府以南^②。

李希托芬^③的功绩还在于他找到了卡蒂加拉的位置。出于历史的和语言的考虑,他把这一港口确定在红河入口处附近,即今之河内城郊。这样看来,秦奈地区相当于交州(东京湾)^④和中国的南部,而位于卡蒂加拉东北部的秦奈首府显然就是古都洛阳城,即今之河南府。 XXIV

① 普纳佩尔(Punappel)的论著:《托勒密地理志中的印度群岛》(载《荷属印度语言、国土和人种学杂志》,1870年号,第36页),这就是某些作家们所得出的不可信的结论之一例,他们认为从托勒密图上找到一个标记之后就可以以此为出发点而考证清楚全部地图了。

② 托勒密也提到了印度洋中的许多岛屿。为此目的,我想复制其中的§II, 4, 11图,因为它列举了一系列位于锡兰附近的岛屿。实际上,这些岛屿中有一些可能属于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包括在我所勾划的范畴内。

③ 《中国》第1卷,第508页以下。

④ 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此地一直属于中国所有。根据汉文史料记载,166年罗马使团正是由交州海岸而来的。

除此两点以及把耶婆提 (Iabadiou)^①考证成爪哇之外,托勒密书中地名尚仍旧全然不明,而且他使用的方法比上文所述更为令人揣摸不定。马利努斯曾经估计萨达港 (Sada) 和塔马拉港 (Tamala) 之间的水路距离为三千五百节,而塔马拉和金洲之间则相距一千六百节。由于旅途的迂回曲折性,托勒密将这些数据中的每一个数都削减了三分之一(第1卷,第13章,第7—8节)。对于从金洲到卡蒂加拉的距离,马利努斯则根据某一位叫作亚历山大的人的证据为基础,此人曾说从金洲到扎拜 (Zabai) 共用了二十天的时间,而从扎拜到卡蒂加拉共用了“若干天”。一位数学家曾将这句话用“ $20 + X$ ”的公式进行表达,现在尚有待于求 X 的值。马利努斯认为这一天数是一个大得难以数清的数字,因而猜其意为“很多天”。托勒密则认为这个解释是“荒诞可笑的”,通过与一个前文已出现过的类似情况相比较,他建议将“若干天”理解为“很少几天”的意思。我极力避免偏袒某一方的解答,因为这一问题中尚包括有许多未知数。我只是坚持指出那位亚历山大地理学家推理中的某些经不起推敲之处。我这样做丝毫也没有贬低其著作价值的意义,不过指出其用笼统的办法来阐明一幅托勒密地图的危险性(我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作法)。仅仅拥有一两个有把握的考证就当作绝对

XXV

① 托勒密 (VII, 2, 29) 解释说:耶婆提意指“栗岛”。爪哇岛的梵文名字 *yā-vadvipa* (栗岛) 实际上也有这个意思,有关这一名字的起源问题,凯恩 (Kern) 已经多次讨论:《爪哇和金洲》(载《荷属印度语言、国土和人种学杂志》,1869年号,第638页);《爪哇名称的起源》(同上引刊物,1871年号,第116页);《耶婆提考》(同上引杂志,1905年号,第365页)。参阅伯希和,《广交印度两造考》(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4卷,见第265页以下)。

可靠的标志是不行的，有某些多少算是巧妙的计算方法就要修改和解释托勒密的全部地图是没有充分理由的。我不侈谈托勒密研究方法会足以表明他的地理志中关于远东那部分是如何写成的，它是用各种来源和时间不同的资料按照一现成的框框进行编纂和凑合而成的。我需要立即补充说明：他别无二法，现行的托勒密著作与他的前辈相比仍然有巨大的进步。正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难以做得更好的时代，人们如若苛求他作出超越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那就不公道了。对逐渐了解托勒密书中的图表也不应失去信心，我们已经看到了李希托芬是如何通过一种兼有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终于定论性地考证了某些孤立摘录的地名。我认为这是用来解释托勒密著作而采用的唯一合适的权宜之计。

如果除去那些真正是引自原文的摘录，诸如包撒尼亚斯(Pausanias)、巴尔德萨纳(Bardesane)、伊比芬尼亚(Epiphane)、阿米安·马尔塞林(Ammien Marcellin)、泰奥非拉克特(Théophylacte)文的摘录外，托勒密以后的文献仅提供了很有限的一部分新资料。我们的研究中最后这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消极的成果，但也并非毫无价值。我们已经看到，马利努斯和托勒密编纂成书的大量资料所涉及到的是一个贸易活动兴盛的时期。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此后这段时期西方有关远东文献的稀少或者平淡无奇的原因一般都是由于旧大陆两端之间贸易交换停滞而造成的。

百科全书编纂者德尼斯(Denys)用诗体写了一部地志，后来的地理学家曾反复援引和转抄，他关于远东的某些概念是引自普林尼或梅拉著作的。他谈到过金洲岛，认为它位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于旭日照耀的地方。他也提到吐火罗人的邻邦赛里斯人，他们擅长纺织珍贵织物，这些织品是用田野中鲜花为原料的。他
XXVI 还补充说，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赛里斯人不饲养牲畜。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荒谬的解释是如何产生的。

包撒尼亚斯首先作出了比较合理的描述，他对于赛里斯人采集蚕丝的描写基本上是准确的。据他认为，丝是一种希腊人叫作“赛儿”(Sêr)的肥大虫子的产物，从而比较鲜明生动地描写了这些动物的饲养法。他对这些动物“饥饿”的隐喻证明他对它们的习惯，甚至它们的天性都很了解。但是，他显得对赛里斯人的资料记载掌握得很少，然而，必须牢记他著作中所记的这件事：“对于某些作者来说，赛里斯人是斯基泰人和印度人的混血种”。

现在我们简略地提一下卢西安(Lucien)所谈到的赛里斯人长寿的问题、加里安(Galien)禁止在某些情况下食用赛里斯苹果的问题^①。我们以巴尔德萨纳的一段文字为例，西赛尔(Césaire)、哈马尔托尔(Georges Hamartole)、赛德尔努斯(Cedrenus)和福兰茨(Phrantzès)等人也都引用过这一段，我们从其中获悉赛里斯人的法律严禁凶杀、卖淫、偷盗和崇拜偶像，人们曾极力试图从这一说法中发现古代儒家在遥远地区的反应，在奥里热内(Origène)^②所转引的赛尔斯(Celse)的文章中特别强调赛里斯人的无神论问题。为提醒大家注意，我们也引用索林(Solin)的一段论

^① 这里不一定是指从远东直接进口的一种水果，而是指这种果树可能是外来品种。

^② 另外，奥里热内也向我们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确切资料。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说在三世纪的前半叶，赛里斯人中尚未开始布讲《福音书》。

述，他的著作只不过是照抄多少有些删节的普林尼著作罢了。还得略述一下伊彼芬尼亚的文章，它向我们揭示了赛里斯人风俗习性的一个奇怪特点^①。然后，我们再花点笔墨来论述阿米安·马尔塞林的著作。

阿米安·马尔塞林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对于本书所涉及到的内容，应该感谢他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生动而又十分准确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仅仅从托勒密书目中才知道的。大而言之，他对斯基泰和赛里斯的描述与托勒密的记载相吻合，他熟知并利用过托勒密的著作。但是，无疑，他也利用过其它一些作品，甚至也许还包括马利努斯的作品，因为他向我们提供了某些新的细节。最有意义的无疑就是他提到了“长城”(第94页)：长城的建造要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西方在四世纪才首次提到它，但是谁能肯定在未曾流传下来的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不会偶有一、二提到它的地方呢？

XXVII

我们从巴拉迪尤斯(Palladius)的著作中也发现了马尼奥莱(Maniolai)群岛的记载，这个群岛会吸住装有铁制品的船只，尤其是比萨德人(Bisades)的船只。毫无疑问，比萨德人就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和托勒密书中向我们介绍的那个叫作 Bêseidai 或 Bêsatai 的民族。巴拉迪尤斯对他们的体形所作的描写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即这里指的确实是阿萨姆某一种蒙昧部族。相反，他对“赛里斯”一词所作的定义却相当令人费解：赛里斯几乎是印度的一部分，也许是突厥斯

^① 如果在这里把结发和使用香料的习惯也归于赛里斯人，那也是毫无疑问的。